

生命与历史的迷思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

谭 玮

[摘 要]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素以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议论著称。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他以沉重严肃的哲思姿态和简洁轻巧的文学话语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奇妙的小说意境,堪称现代哲理小说的典范。小说对生命“轻与重”的哲学思考,源于作者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的深沉反思。

[关键词] 米兰·昆德拉;轻与重;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6-0721-05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米兰·昆德拉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其品种之全、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前所未有。对于此令人瞩目的奇迹般的热点,究其原委,恐怕应该归功于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对我们曾经所处的“文革”情境相类似的历史情境的精确描写和深刻思考。这些描写和思考,既令我们感到历史的熟悉,又让我们在精神上感到陌生和惊讶,仿佛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相形之下,我们80年代初曾经红火一时的“伤痕文学”显得感性而青涩。

米兰·昆德拉小说较早被译介的有韩少功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徐乃健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吕嘉行译的《笑忘录》等几种,不久米兰·昆德拉的全部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且大多不止一种版本。国内学界对米兰·昆德拉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在这些研究中,很多目光都投向了“轻与重”、“媚俗”、“牧歌”这些极富哲理、意蕴深长的文学主题。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各种学术和非学术的讨论中往往充斥着对米兰·昆德拉作品及其思想的误读和曲解,甚至出现了“用媚俗的姿态去理解米兰·昆德拉的反媚俗思想”的笑话。有鉴于此,有必要首先对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思想进行文化上和历史上寻本溯源的考察,方能避免上述误读和曲解。本文即从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文本解读出发,力图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寻找和分析米兰·昆德拉的思想进路,以期能够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和更加清醒的目光来认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与重”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开章明义,落笔之始就残酷地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永恒的难题:生命,是轻还是重?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沉重还是轻松”,这是一个永恒而又难解的问题。种种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并最终归结为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哲学沉思。我们可以说,几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全部的内容,都是在这种哲学沉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大量富有哲理意味的议论,并且在叙事过程中多次重复暗示这一主题。如: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

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1](第 27 页)

他和她一起上了停在房前的汽车,直奔火车站,取出箱子(箱子很大,重极了),带它和特丽莎一起回家。^[2](第 11 页)

在小说中,主人公托马斯始终徘徊于灵与肉、性与爱之间,对爱情进行着“轻与重”的追问。他视简单的肉体之爱为真正的、“轻松的”爱情,并且以这种可以随意与多个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自由单身生活为达到“生命之轻”的标志之一。为此,托马斯甚至放弃了与妻子、父母、孩子之间的人伦之爱。他认为那种“爱”是责任,是负担,是让人生活受压抑、生命被扭曲的“重”。但是在托马斯遇上特丽莎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单身的托马斯出于“奇怪的同情”而接受了萍水相逢的乡下小酒馆女招待特丽莎,但同时意识到“箱子很大,重极了”。这说明他的这种接受是近乎无意识的、困惑不解,甚至疑虑重重的。因为这个举动使得他背叛了自己的“轻松”。托马斯进而发现,同情——这种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居然是最高档次的爱情。它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最真诚的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出于生命本质的感情使得生命随之变得沉重,“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就这样,米兰·昆德拉通过托马斯的爱情观的重新定义,达到了对生命轻与重的解构和反思。

不仅如此,米兰·昆德拉还通过对托马斯的社会活动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进行了“轻与重”的思考。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托马斯先是竭力把自己置于一种绝对轻松的环境之中:没有家庭的束缚,职业简单独立(专业医生),不过问政治和社会事件。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和政治高压的到来,残酷的现实使托马斯意识到:不与或尽量不与社会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世俗生活的“沉重”归根结蒂也是人的生命必须承受的东西,因为人毕竟不可能像动物一般地“轻松生活”。如果说对爱情的重新定义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轻与重”的颠覆的话,那么对人的社会角色的反思则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不可逃避的宿命。

最终,对爱情和社会两方面的“轻重之辨”归结为对生命本身意义的反思。在小说里,这是以对贝多芬的音乐的议论为象征的。音乐象征着生命。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惊讶。……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3](第 172 页)

这是一种无限二律背反的哲学反思: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轻松的“戏谑”,是“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但是作为生活于社会中的、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感情的人类,却不得不把它变成“形而上的真理”和“严肃的四重奏”。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轻松和自然,而是戴上了沉重的面具。在这二者之间,到底何为积极、何为消极?轻还是重,哪个才是生命的意义?

一个倍感生活沉重的人,厌倦于“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的社会规则,满怀渴求地去追逐生命之轻。像托马斯,他抛弃了婚姻、家庭甚至是亲情,独自享受着“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生命之轻。但是难道生命真的就是轻的吗?托马斯的困惑告诉我们,没那么简单。

综上所述,针对生命之本质的形上思考,形成了米兰·昆德拉小说“轻与重”的主题。昆德拉用简洁生动的情节描写以及大段夹叙夹议的抒情性文字把这个深奥晦涩的主题表现得入木三分。那么,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思想线索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把眼光投向作者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语境

二、“轻与重”的文化溯源

如果把上述对生命之本质的形上思考放到更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的话,我们会不难发现,它不仅是米兰·昆德拉的主题,而且也是自古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思辨中争论不休的主题。因此,对其进行一番溯源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更深刻地把握米兰·昆德拉小说中“轻与重”的内涵。

在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滚石上山,每次石头都从山顶滚落,如此循环不已。这个简单的神话让人着迷之处,就在于它暗示了上面所提到的难题:生命的本质——是轻,还是重?

神话文本提供给了我们两个“关键词”:目的和循环。相应地,关于生命轻重的问题也就分割成两个方面:

生命的意义何在?——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

历史的真相何在?——是无限循环的来回往复,还是一去不返的虚空?

我们可以看到,西绪福斯的命运给我们的答案是:人生是有目的的,历史是循环的。在西绪福斯那里,人生的目的就是滚石上山,这是神的旨意,是命运。而历史的循环,就是那永远往复不停的大石头。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因此,生命的本质是重的。

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暗喻之一。对生命本质的这样一种理解,表明了远古时代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物质的匮乏,条件的落后,人力的渺小,对自然的困惑和敬畏,无不使远古的人们感到一种不自由的束缚感,这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是令人敬畏的“神”加于人们头上的命运。可以说,这是一种伴随着原始宗教信仰而生的哲学思想。它认同了自然对人的束缚,并将其归结为生命的终极意义。

按照这种思路探寻下去,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绪福斯式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这种暗喻式的观点达到更高的形上层次的产物,是表现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之中的一些观念。如最早的赫西俄德把世界和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三个历史循环学说,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历史在不断循环,最好的黄金时代过去是稍次一等的白银时代,接着是最糟糕的青铜时代,当青铜时代毁灭后,整个世界又回到黄金时代。如此循环往复。这与西绪福斯的巨石何其相似!而人处于这种无限循环的、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历史之中,怎能不感受到生存的沉重——同时又是坚定?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人所需要的做的就是走下去。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的。人生和历史都是一成不变的,有着固定的目标。而继承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更是建立了一个“理想国”,设计了人类所理应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在他看来,“理想国”是宇宙间的至真至善的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生命的目标和历史的最终归宿。总之人生有方向,有先验的规则和目标,历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义的。

这样的生命观、历史观的思维模式延续到中世纪,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上帝”战胜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国,祈祷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相比之下,宗教外衣下的这种生命观和历史观比以往更具有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倾向,顺从命运、坚定信仰被赋予“至善”的定义。而那些异想天开特立独行的思想,自然就被看作“异端”而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之重”被彰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轻松自由的生存本质已经被“上帝的荣光”所遮蔽。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重”持肯定态度的生命观,已经从最初的自发地对自然敬畏、对命运顺从的感性认识发展为具有价值判断的哲学观念,它强调了社会的责任、历史的循环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漫长的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占据着“正统观念”的地位。

但是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这最早可以溯源到酒神狄奥尼索斯:

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巴库斯,原是色雷斯人的神。……巴库斯在希腊的胜利并不令人惊异,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

羡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为上比感情上来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的某些最好的事物。巴库斯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3](第 37 页)

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的”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而在托马斯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那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而到了依壁鸠鲁,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和理论化了。依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善”,尤其是心灵的快乐。主张追求宁静的心灵快乐,“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他尤其反对宗教,认为那是“恐惧的根源”应该抛弃。他并且还否定“天命”,反对灵魂不朽。

这种精神在宗教专制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人性的张扬不可能被永远压抑,酒神精神也永远不缺乏继承人。哪怕是在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纪,也不仅仅只有骑士们在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一文艺复兴伊始,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更是如春雷般滚滚而来。无论是《十日谈》还是《巨人传》,都令正统思想卫道士们瞠目结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涉及对世俗幸福的赞美以及对人性的肯定的段落也比比皆是;通俗的骑士小说中,就连修士也挥舞着大棒,跟骑士们狂欢作乐,口中赞美着酒神和美好的生命。

而到了现代,这种酒神精神的狂欢形式就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大潮中,“人”被重新发现,轻松的生命本质被讴歌和张扬。尼采公然声称:“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4](第 101 页)酒神精神被赋予了更新、更深刻的涵义。这条思想进路对于理解现代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沿着它,在进入视野更广阔、生活更复杂的 20 世纪后,这种对生命之轻的肯定从原先的“狂欢”转为深层的哲学思考,人性之自由被抬高到价值论范畴。萨特著名的命题“存在大于本质”,意即反对先验的“生命目的”或“历史归宿”的设置,主张存在即存在本身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而且不应该被设置、被约束。

而米兰·昆德拉无疑倾向于后一种生命哲学。即:生命的存在本无固定意义可言,历史的发展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而非往复循环的圆形。前者最明显的表现为托马斯对爱情的困惑: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痴,还是爱。……他生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度来度过。^[1](第 7 页)。

而后者则表现为他对历史的思考:

尼采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1](第 3 页)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米兰·昆德拉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倒向酒神和萨特。这在他的小说的标题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份自由存在的“轻”,居然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生命的本质却无法被生命本身所承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么?为什么在充满着解构“生命之重”的倾向的当代社会,昆德拉会用这样一种对“轻”的反思和疑虑的方式达到对“重”的辩证和回归?

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用这种方式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进行了深沉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自 13 世纪以来,捷克就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查理一世的一手遮天,雅盖隆王朝的漫漫黑夜,哈布斯堡的无尽噩梦,再到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最后是“布拉格掷窗事件”和苏联入侵。其间每一次的反抗行为都导致了捷克民族堕入更为深重的灾难。捷克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捷克人民在历经数百年的苦难沧桑后,已经变得麻木,早已习惯了一切,再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也只是“永劫回归”的一场游戏。人生充满了悖谬精神。在这一点上,捷克人民的遭遇与 2000 多年前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犹太民族在饱经苦难之后创造了历史感异常沉重的宗教哲学;而捷克环境下的昆德拉,则在对“生命之轻”有充分向往和认识之后,油然产生了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反思。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深层次反思。

另一方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循环往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呼唤张扬生命之轻之后,必然是对轻的反思和对重的回归,对理性的回归。

综上所述,历史悠久、意蕴繁复的西方文化中“轻与重”纠结缠斗的传统,是米兰·昆德拉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学思想的底色,是其根源所在。而自近代以来捷克在欧洲历史上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米兰·昆德拉认识世界、批判世界的基本视角,产生了其对历史事件的独特描写和阐释。这种描写和阐释给我们的是既在情境上熟悉,又在精神上陌生的独特感受。在这种认识以及历史溯源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思想内涵,并能够进一步地思考我们自身了。

[参 考 文 献]

- [1] [捷]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2] [捷]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 [3]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 [4] [德] 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年版。
- [5] [德]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Weight” and “Lightness” i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entative Discussion

Ta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Milan Kundera, from Czechoslovakia,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riters in the world, whose novel is shaped by profound thoughts and incisive opinions. His novel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is widely known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modern philosophical novels, in which he builds a wonderful world in terms of heavy and solemn philosophical thought as well as concise and literature discourse. The author'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the “lightness” and “weight” stems from his deep reflection on drinking spirit and existentialism.

Key words: Milan Kundera; lightness and weight; Western culture